

為黎明前臺灣點燈的吳濁流

彭瑞金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現 任：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學 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經 歷：◆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 《文學臺灣》主編

◆ 臺灣筆會理事長

代表著作：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

高雄文學史

臺灣文學 50 家

鍾理和傳

葉石濤評傳

鍾肇政學評傳

授課大綱：一、《亞細亞的孤兒》。

二、《亞細亞的孤兒》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

三、吳濁流與臺灣文學。

1、吳濁流文學的特質。

2、吳濁流文學獎與《臺灣文藝》。

3、吳濁流文學與臺灣文學。

四、吳濁流在戰後臺灣建立的知識分子典範。

講 義：

解讀《亞細亞的孤兒》／彭瑞金

本文係應黃玉燕女士重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春暉版而作。



《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最重要的小說代表作，也是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的經典之作。《亞細亞的孤兒》是一部奇書，奇在它不按小說「章法」寫作，事實上，書成之後，在文化上的引申詮釋，遠遠超過文學，在台灣社會學、政治學意義的被詮釋量，遠遠凌駕文學。吳濁流在台灣小說史上，本來就是一個特異的存在。一九三六年，三十七歲時才開始寫第一篇小說，在這之前，他是漢語文言詩人，參加詩社的活動。最早的短篇小說——〈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歸兮自然〉、〈漢譯版題名〉、〈功狗〉等發表時，雖然不是「台灣新文學」陣營中人，大體上都是在台灣新文學的軌道上運作，《亞細亞的孤兒》顯然有脫軌演出的情形。他在漢文版的《自序》中這樣表示：「回想我寫這篇小說的動機，是因為我們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識階級，任你如何能忍耐善處，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這篇小說中的主角一樣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寫這小說來給有心的日本人看看，並且留給我們後代的人知道。」顯然他把歷史反思的意義，放在他的小說創作動機之上，當然，史家作史為歷史做見證的刀筆意義，也就成為了吳濁流日後長篇述作的獨有特質了。

《亞細亞的孤兒》起筆於一九四三年，大約在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之前就完成了。在日文版的《自序》中，吳濁流說：「它是用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的一部分史實來做背景。那時不論任何人都敢用這樣的史實背景寫小說，而把它照事實沒有忌憚地寫出來的。」可見，作者比作挑戰的不是題材，也不是小說寫作的技巧，而是言論自由的尺度。日後，他寫《無花果》、《台灣連翹》，無一不是循著這樣的模式和心態在寫作。雖然這樣的創作觀與以歷史為目的歷史演義不同，它是以人物為中心、以個體思想、感情為主軸發展的「小說」。因此，《亞細亞的孤兒》閱讀的重點是在主角「胡太明」的一生。主角取名「胡太明」就暗藏玄機。

「胡太明」三字，可以解讀為肯定語氣的「為什麼要堅持大明臣民立場」，也可以解讀為疑問句的「為什麼？」，但太明為大明，代表漢民族移民後裔立場、意識的符碼意義，則是一貫的。從整體「胡太明」的人生、心理發展而言，吳濁流對「胡太明」一生所為所求的「意義」解讀，是一種終極解



讀，意義上比較接近疑問句的「為什麼？」這可從兩方面找到證明。首先，《亞細亞的孤兒》在戰後最早出現的版本，就以《胡太明》為書題。書題直譯就是「為什麼要立志為延續漢文化的漢人？」《胡太明》日文原著分為五篇出版，從一九四六年九月至十二月，一共出版了一至四篇，第五篇因二二八事件，承印的「民報」遭封社，已印好的第五篇也遭到封存，八個月後啓封時已散失。其次，一九五六年在日本一二三書房出版時，就改名為《アジアの孤兒》(亞細亞的孤兒)。改題名的原因，據作者自己說是與人名巧合，恐被誤會。「胡志明」係越共領袖，「反共」的國民黨政權絕不容人和他聯想在一起。但作者的一番夫子自道，不但替「胡志明」的題意做出明確的釋意，新題目更為原本的疑問句，標出了答案。很像替「胡太明」回答了他祖父胡老人對他的期待。胡老人在太明九歲時，帶著他翻山越嶺到雲梯書院上學，目的在延續漢文化的香火，太明的一生際遇卻告訴胡老人在天之靈，自己只是「亞洲的孤兒」。「胡志明」和「亞細亞的孤兒」分別是這部作品的「破題」和「結語」。

一九五七年，東京的廣場書房再版時，改題《歪められ島》(被扭曲的島)。漢譯版部分，一九四九年，楊召愬未知會作者逕行翻譯出版的版本，以《孤帆》為題。一九六二年，傅恩榮的譯本，題名也是《亞細亞的孤兒》。後來，廣鴻文版(一九六七)、遠行版(一九七七)、前衛版、草根版，都未註明譯者，卻都用《亞細亞的孤兒》。一方面可能是根據日本出版的日文版書名而來，一方面也接近作者的本意。但是一九六七年之後的漢譯本，題目雖接近作者本意，內文卻幾乎完全根據楊氏的譯本。楊召愬的〈譯者的話〉說：「作者能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中完成本書，倘非出於愛國至誠，確難做到。」明顯曲解作者的著作本意，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該譯本尚蒙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函嘉許、嘉勉，作品遭到曲用。僅從這樣的背景出發，重譯，再出現另一種譯本的《亞細亞的孤兒》，都是必要和急切的。致力於翻譯工作三十餘年的黃玉燕女士，在各方期待下終於在二〇〇五年完成此壯舉，實為台灣文學史的大事。本譯本在二〇〇五年出版後，已在市面上絕跡，今得春暉出版社再版，自是莫大功德。



正如題名上應回歸作者本意一樣，《亞細亞的孤兒》也應該回到文學上解讀。吳濁流說：「一九四三年的戰爭，對日本是個存亡分野的戰爭。故不得不施行其極端的戰爭政策，因此自然而然分為時局投機者和厭戰者兩類，前者頌揚戰爭，推波助浪，後者被嘲為非國民。……在此矛盾中，難免發生不平、不滿、猜疑、嫉 等情形，於是謠言百出。……知識份子都受到謠言的恐怖，戰戰兢兢不知所措，完全沒有主意了。」、「可是，筆者對那個恐怖，卻被心裏急著要完成這篇小說的衝動所壓倒。」強調他住在台北警察署的官舍對面，完成這些極具危險性內容的作品。

完整版的《亞細亞的孤兒》分成五篇。第一篇寫生在亂世濁流中的胡太明，恰逢日本治台、清廷退出台灣的改朝換代，也是代表漢文化的傳統和代表現代新文明潮流的日本文化交替的時代。太明的祖父胡老人即使有力挽漢文化於狂瀾的雄心，也萬萬不敵時代潮流之猛勢，太明勉強由祖父安排進入漢書房，最後還是改讀公學校。漢書房是漢文教育失去科學的功能之後，被普遍用來延續漢文和漢文化的「手段」，但讀漢書的人能做的工作，不過是地理師、漢醫、算命、漢書房教師等，漸趨末路的行業。太明的父親胡文卿是舊知識體系培養出來的漢醫，便充分體認到舊知識體系在新時代的不足，為了正確處理土地問題，以及佩服西醫處理急救、傳染病的效率，努力吸收新知，以趕上時代潮流。然而，胡文卿畢竟是本質上還是舊人物，有了錢有了地位之後，舊鄉紳的毛病就來了，染上了金屋藏嬌、娶妾棄糟糠的惡風習，即使中了仙人跳也不回頭。胡太明雖然也在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順利當上穿文官服的教師，仍然深切感受到自己是時代夾縫中的人物，他不能像父親那樣，完全屈從於現實，祖父、彭秀才堅守的古道、舊家風，又明顯趕不上時代潮流。對父親的行徑失望，埋葬了彭秀才，夾處新舊之間，令太明深深覺得自己被「台灣」困住了。實際的牧師經驗，讓他深刻地體認到內、台不一，及至告白遭到內藤久子以彼此不同類拒絕，太明的挫折讓他下定決心越過波濤，遠走他鄉。

胡太明是在各方壓力的夾迫下，毅然放棄教員的工作「走出去」。太明的出走，固然是受到同事曾訓導激烈思想的刺激，但畢業於明治大學、在中國住了四年回來的師範前期同學也明白告訴他，「台灣人到哪裡都因為是台灣人，



而處於受歧視的立場，……」中國因為排日，台灣人也不被接納。第二篇寫胡太明以此無比堅定的決心和堅毅的意志「出走」日本留學。到了日本之後，先是滿心歡喜地讚嘆：「優美的國土，優美的人民！」及至他找到昔日師範學校時代中途退學的藍姓同窗，對他說的一番話——「台灣是鄉下，你所持有的思想，在這裡不適用，你從一年級生從頭開始學習吧。」、「你在這裡最好不要說自己是台灣人。台灣人說的日語很像九州口音，你就說自己是福岡或熊本地方的人。」令太明意外的大概是，在台灣當台灣人不過是內、台不平等的二等國民，至少都還是台灣人，到了日本，台灣人卻自動放棄台灣人的身分。太明進入工業學校就讀，以到日本留學的目的是求學問，拒絕參加「台灣青年」。太明低調卻堅持「台灣人」的身分。激進的藍，不敢在日本人面前表白台灣人的身分，卻用北京語和中國人打成一片，高呼：「建設新中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廣東來的中國人，也認同太明的客家身分，一聽到太明是台灣來的，立刻翻臉說他是間諜、日本特務的爪牙，太明氣得調頭而去，藍反責太明是不足與共事的「豎子」。太明的日本留學經驗，讓他見證到台灣人離開台灣之後。如何地自我消解。太明回來之後，一直找不到工作，家族裡的成員為了分產的事勾心鬥角，生命陷入迷惘與徬徨，有一天，因巧遇公學校同事黃君，應邀到他的農場幫忙。太明生活的新目標是對農場女工施行現代知識教育，教導她們日語、算術、生理衛生的基本知識，避免孕婦因難產、拒絕男醫而死亡的不幸事件重演。平靜的田園，終究難敵嚴酷的現實，黃君的農場經營不下去了，特務的爪牙也找向太明，太明興起遠走中國的念頭。太明第一次離去，是在尋找「台灣人」新的、開闊的生存空間，固然鍛羽而歸，但歸來的故鄉已沒有他的棲身之處了。再次離去，可以說被迫出走。而且，這一趟出走，他已經沒有「幻想」。太明在開往中國的船艙作了一首七律，抒發二度出走的心情，因為自覺日本籍民的身分，字斟句酌之後，把第七句「豈為封侯歸故國」改為「豈為封侯遊大陸」。

第三篇描寫太明在南京的境遇。促成太明南京行的曾某，為他找了一份教師的工作，不過由上海登岸時，曾某就叮嚀他不可洩露二人的台灣人身分，「我們無論到哪裡都不會被信用，如宿命的畸型兒似的。我們本身沒有任何的



罪，卻要接受這種待遇是不公平的。但這是無可奈何的。我們不要有成爲受排斥的繼子根性，我們不是要用語言，而是用實際行動來證明，爲建設中國而犧牲的熱情，我們不落人後。」太明的日本經驗，讓他能理解曾的心態，不致調頭而去，卻不放棄自問：「因爲是『蕃薯仔』（台灣人的別稱），爲什麼就必須忍受如此屈辱呢？太明這樣想著心情暗澹起來。」太明逐漸體會到，生爲台灣人，似乎必然面對原罪般面對被扭曲的命運。

太明在上海看到的是，「以讀書人爲傲的封建思想的殘滓」，以古典的幽雅活在近代文明裡的上海，太明認爲「這些……只使人的靈魂麻痺，沒有使人靈魂安祥之物。」太明離開上海到南京的火車上，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子穿著鞋子，站上天鵝絨面的座席從架上取下行李。到了南京看到的是徘徊街頭的乞丐、野雞，破壞公園的動物，只知大砲數目的花花公子，從睡夢中醒來，不是應酬吃飯、打牌就是聽戲。專注牌局的父母，下管孩子生病、發高燒。太明後來與淑春(穿著鞋站在坐席上拿行李的女子)結婚，產下一女後，把孩子交給奶媽，照樣出去跳舞打牌。太明根本無法從淑春身上找到慰藉，又不能做盲從的愛國王義者，本質上，他還是漂泊、無依的孤兒。

西安事變後的某天半夜裡，首都警察逮捕了他，理由顯然只是「由於他是台灣人」。連乞丐、野雞都可以存在的南京，卻沒有台灣人存在的空間，除非和曾一樣，掩藏著自己的台灣人身分。太明雖然從不掩飾自己台灣人的身分，也必然也是有人檢舉才會被逮捕，太明的中國行，見證了「台灣人」也是犯罪的一種理由。太明被關在充滿臭氣臭蟲的陰暗斗室裡，設若不是嫁給警官的學生素珠和幽香聯手相救，胡太明這亞細亞的孤兒，很可能就要成了中國南京的冤死孤魂。

第四篇寫亡命回到暗淡故鄉的胡太明，立刻成爲警察監視的對象。家整個變了，也可以說已完全屈從於日本人的統治了，哥哥志剛當了保正，並把一部分房屋改成榻榻米。中、日戰爭爆發後，民間物資被搜括，不能享有正常國民權利的台灣人。卻要負起超過一般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太明爲免出門被跟蹤，乃閉門讀書，日本人卻不放過他，以海軍軍屬的名義把他召赴戰場，派赴廣東。在這裡，太明見識了殺人如兒戲的戰爭荒謬，目睹一場爲節省子彈改用



武士刀行刑的十八名死者的酷殺時，太明當場昏了過去，並高燒囁語，終於被認為不可救藥送回台灣。

隨著戰局的吃緊，皇民化的步調也加快了，太明回鄉靜養時，當保正的哥哥、鄉長助理、附近的知識分子都改了日本姓名。此外，太明在自宅附近墾地種香蕉，也被水利會的巡視員指為擅自開墾。太明接著收到水利會的通知，為了增產需把水池填平，改為水田。然而改作水田的水池，年收穫量不過千斤。依照公定價格僅值九十二元五角三分，需繳特別水租三十五元，加上普通水租，以及開墾費和地租。比買新田還貴。何況，水池填平，池下方四、五甲地要變成看天田。戰爭使人瘋狂，為了增產，鄉公所要求農民要正條密植，插秧的間隔用尺測量，縱二十一公分，橫二十公分，七十歲的老農憑自己的經驗，知道怎樣插秧收穫量最高，檢查員硬是逼老農把一列列插好的整齊的稻秧犁掉重插。市上已買不到米了，官方派出搜索隊搜查私藏的米。太明的母親，可以說是被「食日本屎」的保正兒子氣病致死。太明的同父異母弟志南加入青年團，又被迫申請志願兵。太明以黎明前的黑暗形容這個時代。

第五篇從珍珠港事變寫起。太平洋戰爭開始後，苦無出路的太明，在糧食局外圍團體米穀協會找到會計的工作，這份工作讓太明澈底見識了日本官僚的貪腐、無能，有許多學歷、教養良好、品德高尚的台灣人，無法任官。太明離開米穀協會後，短暫到台北的雜誌社服務，接到動員令，須出席勤勞護國獻身會，再回到故鄉時，則遇到鄉公所的職員挨家挨戶收總動員獻金，看診一人三角錢的胡文卿，應捐一千元。除了這些物質的剝削，還有精神上的麻醉，戰爭時期的台灣人，可以說陷入全民瘋狂的狀態，志剛的兒子達雄，大學不念了，要參加志願兵，志剛迷於皇民化，竟然很高興，經過太明激烈的駁斥，達雄才表示重新考慮。太明的弟弟志南，因為被召去勞動，過度勞動病倒了，送回來下久便死了。弟弟的死，導致太明瘋了，終日吟誦的是：「頭家是大哥／大哥是賊頭／人剝皮／樹剝皮／山也剝皮」、「白晝上匪」，幾個月後，太明便突然消失了，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亞細亞的孤兒》是以一個虛擬的台灣知識分子胡太明的一生，對照出來的台灣知識分子生命史，也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知識人的心靈告白。祖父胡老人期許太明延傳的漢文化香火，經不起時代、現實和新思潮的衝擊、考驗，早已油盡燈殘。太明經由日本教育，接收到的訊息是西方現代化社會，立足在人道、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的社會理想。因此，太明自己乃至他的家人，沒有殖民地社會下層饑寒不能度日的問題。太明不顧一切地從台灣逃出去，逃到日本留學，逃去中國就業成家，才終於發現天地之大，並沒有台灣人可以遁逃的空間，像「原罪」一樣，台灣人無論逃到哪裡，都要背負著這樣的原罪。太明身邊的親人，包括父親、兄弟、朋友、同學、同事，有的把自己在台灣人的身分隱藏起來，不讓人發現自己的台灣人身分，逃避面向原罪；有的則是積極地向統治者屈從，接受改姓名、皇民化，藉以塗銷台灣人的身分，洗脫與生俱來的原罪。

既是「原罪」不能洗脫，只有救贖。胡太明的一生際遇，正暗示著這樣的救贖，既是救贖，依舊不能規避生為台灣人具有的一切。胡太明最早藉由出走換取台灣人生存空間的作法，未必是正面迎向命運的作為，但出走一次即增加一重他做為台灣人的苦難重量，胡太明並不輕易放下，反而一次又一次的選擇出走，是否也暗示了那才是「承擔」？尤其是隨著戰況的進展。太明每一次從外面回來，都發現統治者讓他更難在自己的土地上立足，家鄉的鄉親族人則進一步被隔離台灣人意識，更進一層被同化。戰爭末期的瘋狂榨取，讓台灣人在為「聖戰」瘋狂中，連根拔除台灣人的自主意識，讓台灣人從身體到精神，都成為漂泊、浮游人間的孤兒。吳濁流安排胡太明發瘋後消失，正表示胡太明是亂世濁流中，唯一清醒的台灣人，隨著他浪跡天涯的，也是唯一被保存下來的台灣人意識。亞洲的孤兒不是浪跡天涯卻尋父尋母，亞洲的孤兒是在自己的家鄉母土歷經劫難之後，倖存人間的一線台灣人香火。

- 參考書目：**一、黃玉燕譯，《亞細亞的孤兒》，高雄：春暉出版。
二、吳濁流，《吳濁流集》，臺北，前衛出版。